

第二章 理論及文獻回顧

第一節 常民理論(Lay theories)

一、什麼是常民理論？

一般人對於社會世界現象的本質是什麼？事務是如何運作？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種現象，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這套結合觀察、媒體報導、個人經驗所形成看法就是所謂的「常民理論」(lay theories)(Furnham, 1988:19)。這套個人理論不同於科學性理論一般論述清楚、立論嚴謹，而且通常個人彼此之間理論也因人而異。

Furnham(1988:1)在《常民理論：社會科學中每日問題理解》(Lay Theories: Everyday Understanding of Proble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一書中，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概論就針對常民理論及科學性理論進行區分。Furnham 曾在進行區分提到，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中如人類學(anthropology)、心理學(psychology)、犯罪學(criminology)及社會學(sociology)針對某些特別行為現象如青少年、貧窮及酗酒等成因，提出「明確」(explicit)、「正式」(formal)、及「科學」(scientific)的解釋，同時，一般常人也對相同的行為發展出「不明顯」(implicit)、「非正式」(informal)及「非科學」(non-scientific)的解釋。

Willett Kempton(1987:222)在研究美國人如何使用家庭電熱控制器(Home Heat Control)時也發現，一般人在一天之內就學會如何調整控溫裝置，而這些知識學校課程並沒教授，但是一般人卻會將相關的現象及知識相互連結，以理解其所身處的環境，他稱這為民間理論(folk theory)。他表示使用「民間」(folk)一詞在於指出這些理論是由社會群體所共有的，並且是由每天經驗或社會互動所取得。

無論如何，在進行常民理論與科學理論比較之前，必須先認定常民理論的理論地位，如此才具有比較和立論的基礎。Kuhn (1970)認為理論(theory)所指的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Shoemaker(1984)強調，理論一詞對許多人有不同的含義，但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出於對觀察的理解企圖。因此，所謂純粹的觀察並不存在，所有的觀察都加諸個人理論，任何的觀察、解釋也都是根據理論而來的。

Kempton(1987:223)也曾經對民間理論進行定義的分析，他認為使用理論(theories)¹一詞在於強調一般人會將抽象概念(abstractions)應用到許多類似的情境，進行預測並引導個人的行為。由此觀之，常民理論可以定義成一般人認識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並以此為基礎進行世界的探索。一般人在進行社會現象解釋時，就是依據此一理論從事假設、推論、描述、詮釋等認知活動進行，只是通常不會感受到它的存在。

不過，許多學者認為使用「常民理論」(lay theories)一詞容易造成誤解，因而改用「常民信仰」(lay belief)。Fitzpatrick(1984:21)認為理論一詞隱含高度的秩序、一致性、穩定性、及合理性，而這些特質在常民概念都不是最本質的。

Norman(1980)則是偏愛信仰系統(belief system)一詞，因為它結合了社會科學及認知領域。他認為「信仰系統」的概念不僅具有文化知識的意含，也牽涉到記憶、知覺、問題解決等相關問題。而「系統」更具有整合概念，所代表的是一組信仰及態度，而非單一群體的信仰。

二、常民理論的特色

藉由比較常民與科學理論間的差異，有助於描繪出常民理論的圖像。經過不同學門研究，Furnham(1988:2-12)列出了常民理論的特色。

¹ 注意英文字中複數的使用

(一)、不明顯(implicitness)與非正式(informality)

常民理論第一項特色為不明顯(implicit)，它們通常是不易察覺，隱含在文化或是語言之中，是一種心照不宣以及不具特別性的假設或是自明之理。相反的，科學性理論相較之下較為正式(formal)，具有內在邏輯的一致性。一般人對特定的現象或行為進行解釋時，其實並不清楚這些解釋是源自於哪些特定的社會政治、哲學或經濟的傳統典範。

(二)、不連貫(incoherent)及不一致性(inconsistent)

因為常民理論鮮少以正式型態呈現，因此常常是模糊、前後不一、不完整的，甚至一般人持有兩個互不相容或是矛盾概念及信念而不自知，更不會受到概念前後不一致所困擾。相反的，科學性的理論則必須要求完整及前後一致。長期以來，科學性理論一直強調平衡(balance)、一致(consistency)以及突顯不和諧(dissonance)，同時也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論來探討一般人如何、何時及為何在其信仰上出現不一致。以經濟概念而言，許多人常同時肯定工作及休閒的價值，卻鮮少發現這兩價值本質上是相衝突的，認為失業是個人能力的問題，卻又認為政府應多增加就業機會。

(三) 印證(verification)與歸納(inductivism)推理

一般人使用印證(verification)來進行推理--即蒐集證據之後才推演出理論。仔細分析，在於常民習慣使用歸納法(inductivism)，也就是藉由觀察及實驗法蒐集證據之後，再進行推論或擬定理論陳述。

(四) 因果混淆

因果關係混淆是常民理論的另一項特點。常民理論實際上就是因果相關，因此很難去推導原因。一般民眾習慣常從兩個變數(variables)去看關係，例如一般常民經常會認為收看電視增加與青少年犯罪的增加有關。上教堂次數減少與離婚

率增加有關。失業率升高與自殺率升高有關。一般人多半認為 A 與 B 之間的關係不是 A 造成 B，就是 B 造成 A，往往忽略第三因的存在。

本部分針對常民理論的特色進行一概括的介紹，發現常人理論通常是隱而不顯、立論基礎較為薄弱、過程欠完備、結構也傾向單一面向而且因果經常是混淆。而這些特點在一般人對經濟議題如失業的探討上，又呈現出哪些顯著的傾向？下面即針對常民的經濟理論進行探討，特別是在失業議題上。

三、常民的經濟理論

經濟學是什麼？有些經濟學家嘗試將艱澀難懂的經濟學理論，轉變成日常生活中俯首可得的生活現象。Todd G. Buchholz 在 *From Here to Economy* (中譯《經濟學的第一堂課》) 中說：「真實的生活就是經濟學。真實的生活就是找工作、克服不景氣、對抗通貨膨脹、存養老金、投資共同基金或股市。」生活脫離不了經濟，但是一般民眾對經濟學家常掛在嘴邊的凱因斯學派和貨幣學派既不熟悉也不了解，在面對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升高等整體經濟結構歷經轉變時，是如何解釋這些與自身相關的經濟情勢？

一般民眾對所見所聞的經濟議題，一直以來都有自己的解釋及看法，為麼有些人有錢？有些人貧窮？是哪些因素造成了失業？又要如何搶救失業？常民解釋(lay explanation)就是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而常民經濟學(lay theories in economics)的相關研究，也就是探討「一般」(ordinary)大眾對經濟議題的理解以及一般大眾觀點和菁英(elite)的意見，或具有充分智識者的觀點的不同之處。

接下來，要問的的是，為什麼常民經濟信念(lay beliefs)重要？態度(attitude)及信仰(belief)的結構與內容，如何轉變，如何受特定群體所支持、所共有，長久以來一直是人類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關心的焦點。而常民信仰研究不僅於著眼於

此，更關切這些信仰在民主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有一部份是由公民所決定、所構築的。尤其是在民主政治體系中，政黨的言論及政策與廣大選民一致或相似，握有執政權力的機會就大增。也因為如此，政府的政策必須經過常民信仰合法化(legitimize)這一道程序。以民眾對社會貧富看法為例，如果一般民眾普遍認為高收入是努力、從事風險的代價，這群人夠格擁有財富；貧窮是導因於懶惰、缺乏動力，政府也就會傾向於低度介入，刪減相關「社會工程」的福利救助計畫，讓貧窮問題「自然」導正(Lewis, 1995:13)。

(一)常民經濟信念結構

學者對常民經濟信念的研究，基本上是研究常民對特定經濟現象的歸因方式(Furnham, 1988:125)。歸因理論是社會心理學中，研究有關人們如何解釋和推測他人或自己行為過程和行為原因的理論。Furnham(1988:130)歸納經濟學常民信仰三個研究重點及方向：首先，研究者關切的是常民信念(lay beliefs)的結構，探尋的是一般大眾所遵循的常民思考類型。第二則是常民信念的功能，研究者旨在發現經濟信念會因為個人自身成功或失敗經驗，而扮演防衛或增強的功能。經濟信念的決定因子則是另一個研究的重點，研究者發現影響常民信念的決定因子包括人口變項如教育程度、年齡、性別或階級，媒體的暴露量及黨派和投票行為都會影響經濟信念。

由於經濟議題繁雜，一般民眾並不會如經濟學家般進行對所有的經濟現象進行理論申辯和模型的建構。常民經濟信念的議題，經常是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並具有政治意涵的總體經濟的議題。Furnham(1988:130-147)就曾對失業率(unemployment rate)、貧窮(poverty)、富裕(wealth)及通貨膨脹(inflation)等經濟議題進行研究。結果發現除了牽涉到總體經濟的通貨膨脹之外，民眾對失業、貧窮及富裕等現象的常民解釋可劃分為三類：

1. 個人因素(individualistic factor)：又稱為內在因素(internal factor)包括個人的工作意願、能力、及努力程度)；
2. 社會因素(societal factor)：又稱外在因素(external factor)，含括政府政策、產業現況、社會結構(尤其是指社會階級)、工作困難；
3. 運氣因素(fatalistic factor)：景氣循環、不幸、機運、身體殘疾及其他無法控制的原因。

以失業的常民解釋為例，許多學者發現長期失業者對自身失業的現象，所採取的思考類型通常較為負面。一開始失業者會傾向將自己或他人的失業原因歸咎為社會(societal)或外在(external)因素，然後這些解釋會轉為運氣(fatalistic)不佳始然，最後變為歸責於個人(individualistic)，自責自己所處的困境(Furnham and Lewis, 1986:160-162)。惡性循環的結果，失業者自信及對未來的期望更加低落(Furnham, 1985; Feather, 1982)。期望及自信無疑的會影響到工作尋找，進而又降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自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sies)於是發生在失業者身上。(Furnham and Lewis, 1986:164-165)。

Feather 及 Davenport 研究澳洲青年失業的情形雖採用不同的歸因方式，但大體上仍不脫 Furnham 的分類。Feather 及 Davenport(1981)的研究發現，澳洲人對失業的解釋可分為兩類：一為外在困境(external difficulty)--責怪政府、企業及代表資本家的商會(union)；另一為能力缺乏--責怪自身缺乏教育背景及工作經驗。一如預測，失業者傾向將自己失業的處境歸咎為外在的經濟情勢，而不是自身的能力問題。另一項研究(Feather, 1983)同樣將十九項解釋分成三大類，和 Furnham 相似，分別為個人、社會、運氣，再一步的因素分析之後發現五個詮釋性因素(interpretable factors)：缺乏技能、缺乏教育背景、以及面談或儀態不佳(interview/appearance inadequacy)。稍後 Feather 的研究，則在進行 256 大學學生

訪談之後，總歸結造成失業的六項因素：缺乏動機、不景氣及社會轉變、能力不佳、工作缺乏創意、個人殘疾以及特別原因的歧視(specific discrimination)。Feather 認為研究結果可以證明這些因素與終極工具價值相關，這也進一步支持他的觀點：常民對經濟解釋，並不僅只是中立的資訊運作的產物，而牽涉到個人的認知—情意系統(cognitive-affective system)。也就是說，一般人對一事件的認知，基本上有強烈主觀傾向，不僅包括客觀的事實，也包含對事實的詮釋及評價。

上述的研究結果，基本上是採用歸因理論。不過有些學者認為，對特定事件歸因的形成，不僅僅只是個人主觀認知，還受到社會或團體影響。例如 Moscovici (1981:107-108)認為特定議題的社會再現(social representations)事實上決定人們對失業的歸因。所謂的社會再現指的是由一般人所持有具共識性的信念，因此此一信念是由群體在日常生活中，透過人際溝通所建構而成。歸因理論關心的是個人對事件的歸因方式，社會再現理論關心的是群體或個人如何建立一個穩定的世界秩序，讓多元、新奇與無法預測的行為被賦予意義後，變為熟悉與可預測。Moscovici 表示一般人對一個特定現象會先蒐集資訊、分類並企圖給予解釋。不過，他認為歸因是在社會再現之後：

有些人認為失業者通常是好吃懶做、不幸或沒有能力尋找工作，其他人認為自己是經濟衰退，社會正義下的犧牲者，或者違反資本主義的法則的受害者。前者會將失業原因歸責在個人身上，或是面對世界的方式；後者會將其歸因於一般現象，或個人的社會階級及世界對待他的方式。很明顯的這樣的分歧導因於不同的社會再現觀點，其中一種優先將個人責任、個人努力及個人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方式置於前面，後者則是強調社會不正義及社會責任等，思考個人問題的集體解決方案。(pp.107-108)

根據上述 Moscovici 的說法，社會再現提供一般人理解及評估世界的工具，

而其運作的方式，是依循複雜三重模式。以失業為例，首先必須先有失業現象，其次，形成了個人的失業的社會再現，最後，再從再現中發展出個人對失業的意見。因此，Moscovici 認為，一般人是先有對失業整體觀點，亦即失業是由個人因素所造成或是社會結構因素使然，而這種觀點主導失業理論的歸因方向，如失業者是個人懶惰或社會不正義犧牲品。

社會再現理論同樣說明一般人對特定現象(如失業)，會進行個人理論建構。不過儘管 Moscovici 對這種理論建構方式及形成有不同看法，但是社會再現理論強調社會溝通及互動協商所形成再現的觀點(這應是社會再現理論，加上「社會(social)」一字的原因)，則提供本文探討一般人理論時，也應考慮整體社會情境啓示。我認為社會再現理論強調社會、共享、協商取向，類似本研究下一節所要談論的文化模式，即社會共享的概念架構。這種源於共有社會文化的背景知識，我認為的確影響一般人對特定事件的歸因、評估和詮釋。

(二)常民經濟信念的決定因子(determinants)

1. 經濟知識

探討影響經濟信念的形成因素之前，必須先了解民眾從那些管道取得或了解目前的經濟情勢。學者相信一般大眾每天藉由大眾媒體或個人經驗接觸到世界的經濟情勢(Walstad, 1996; Furnham, 1988)。William Walstad(1996:162-163)認為不同的經濟議題，包括失業率(unemployment)、個人所得、課稅、貧窮、經濟成長、匯率(exchange rates)等可藉由媒體報導及個人實際的接觸而取得，而這些知識及經驗成為一般大眾思考的議題，在思考的過程中也就發展出個人的經濟意見及態度。這些態度及信念並不必然一成不變，Walstad 進一步指出對經濟世界理解是複雜及長久的過程，發展的很早，並持續在教育階段中長成，甚至在離開學校後，經濟的意見及態度也不斷地在改變。Walstad 於是大膽結論：形成經濟及經濟議

題等態度及意見最爲關鍵因素爲經濟知識(economic knowledge)。個人及社會特徵，諸如性別、種族、族群、教育或所得收入同樣也具有某種程度影響，但是這些特徵不是不能影響改變，要不就是改變的速度緩慢。再者，即使有影響，也是以一種不確定的方式進行。經濟知識可以說是唯一影響並可能改變經濟態度及意見的因素，而且是最有潛力在經過一段時間後仍能啓動改變的因素。經濟知識在形成經濟意見及經濟態度形成上，有顯著的正面效果，他認爲此一發現在美國的經濟教育研究中發現一致的現象。(1996：179-180)

2. 媒體觀點

一般民眾經濟知識的來源首推媒體(Walstad, 1996; Furnham, 1988)。另一方面，大眾媒體傳播與揭露相關經濟議題的目的，除了政治意涵之外，最重要的是和整體經濟情勢有非常大的關連。Furnham(1988:125-26)舉英國爲例，英國在 1980 年代經歷失業率快速攀升，迫使英國民眾開始注意到菲利浦曲線(Phillip curve)的涵義，了解通貨膨脹及失業率間存在著抵換(trade-off)的關係，當時許多英國報紙就出現許多相關的報導。台灣在 2001 年經歷經濟不景氣，出現十多年來首次的經濟負成長，失業率更是節節升高，2002 年全年失業率更達百分之五點一七²，相關搶救失業及提振景氣等議題大幅出現在電子媒體及平面媒體的版面中，也因此民眾接觸到相關議題討論的機會也就增多。

Molsey(1983)曾就 1960 到 1980 年間英國受歡迎的報紙進行內容分析，發現支持工黨的報紙對於失業率的報導有詳盡的分析，然而立場傾向保守派的報紙則是在通貨膨脹及支付平衡上做了較爲詳盡的報導。Molsey 指出，媒體對人們經濟態度上的影響，並不只侷限於它們所提供的資訊，同時也傳達經濟變數間彼此關係。除此之外，英國媒體在描述 1960 經濟危機的特別解決方案時，也提供整

² 行政院主計處【重要社經指標速報】

體經濟的共識觀點：失業率降低必須依靠總和供給的增加，而支出赤字及通貨膨脹降低則必須大量減少總和供給，方能奏效。在 1970 年代，民眾所接觸的經濟景象又截然不同，許多英國的報紙深信，通貨膨脹的降低是失業降低的先決條件，Mosely 表示他在媒體中看不到總體經濟學術界中常見的理論：完全就業需要以高通膨來換取(Furnham,1988：126)。

如果要探討經濟新聞的政治意涵，當然不可忽略政治人物如何將其特有的經濟觀點，傳達給一般大眾。最好的例子是英國兩政黨引用的比喻來闡述自己的經濟觀點，為了解釋貨幣學派的觀點，當時的英國首相使用家管(housekeeping)的隱喻，經濟被看成是一個大家庭，而政府則是被看成管家，勤儉美德應受到鼓勵及讚揚，借錢或花費在不必要的事物上，則被看成是不智的行為。另一方面，當時的反對黨工黨則是使用身體(body)來做比喻，當身體的某部分生病(經濟衰退/不佳)，則需要接受特別的幫助及照顧，以免影響到整個身體的健康(Furnham, 1988:126)。從隱喻的觀點解析經濟新聞及政治人物的語言，可以協助了解其底層的思考模式。

3.其他重要的決定因子

儘管 Walstad 對經濟意見的研究有非常肯定的說法，認為經濟知識決定一般人的經濟態度及觀點，Furnham(1982ab)則有不同的發現。他針對年齡、性別、教育及投票行為(voting patterns)為變數，進行失業原因解釋的分析調查。結果發現，就業者與失業者對失業原因的解釋並不相同，前者認為失業原因個人因素(individualistic factor)比例大於社會因素(societal factor)，後者雖在個人因素比例也高過於社會因素，不過失業者在解釋失業原因時，認為社會因素的重要的比例上，高過於就業者。

在各項變數上，Furnham(1988：134)指出：性別及年齡上的差異不大，不過教育及投票行為的差異卻出現不同的解釋。保守黨員(Conservative)或資本家(Capitalist)普遍認為個人因素較為重要；而工黨(Labour)黨員或社會主義者(Socialist)則認為社會因素顯然比個人因素更為重要。相同結果也在不同的研究中獲得證實(Tiffany *et al.*, 1970)。儘管在程度上有所差別，失業者傾向將失業的原因歸咎為外在因素(external factor) (轉引自 Furnham, 1988：131)。再者，在大環境不利，失業率攀高之際，甚至是擁有工作的就業者，也會傾向將失業的原因歸結為社會及運氣因素(fatalistic factor)。此外，整體的經濟情勢也會影響到民眾經濟信念。Furnham 及 Hesketh(1988)就表示在失業率高的英國，比失業率低的紐西蘭更傾向認將社會因素排在個人因素之前(轉引自 Furnham, 1988：131)。

由於西方特殊的文化背景，Furnham 也特別注意到清教徒工作倫理與解釋失業率之間的關係，發現強調工作倫理受訪者會將失業歸為個人因素，而且大部分反對社會福利政策。MacDonald(1971)也發現清教徒信仰者通常為社會責任理論的反對者，傾向於譴責個人而非社會系統(轉引自 Furnham, 1988：133)。同樣的，清教徒解釋貧窮的成因為工作懶散及金錢管理不當，解釋富有是因為認真工作和存款，解釋失業原因為懶惰及不努力，他們反對課稅及社會福利(Furnham, 1982a：283)。從以上的研究可以更加確認經濟信念具有一致性的信仰系統存在，進而影響其對失業及其他經濟行為如貧窮的解釋。

Lewis *et al* (1987)則是訪問 900 名英國人，解釋失業的原因，使用 13 個經濟編碼進行內容分析結果顯示，28%關心物品需求下降，23%關心通貨膨脹，18%關心政府政策，17%關心薪資上漲需求。令人好奇的是，人口變項並沒有非常大的差異，這些研究再由 Furnham 重新分類，結果發現 78%認為失業為社會因素；24%認為運氣不佳；僅有百分之 7%認為是個人因素。令人驚訝的是，失業者所提供的失業原因解釋卻很少純然是經濟的，也就是說他們所提出經濟現象的常民

解釋通常是規範性的(normative)、道德性的(moralistic)、社會政治(sociopolitical)。諸如失業者是因為個人努力不夠才導致失業、新移民佔據職缺、政府施政不力等(Furnham, 1988 : 133-34)。

第二節 文化與認知

本節將探討文化知識如何建構起個人的失業理論。在上一節討論中，得知Furnham(1988)常民理論特色分析偏重在一般人對社會現象的歸因，因此他所列舉的常民與科學理論之間的差異，也就偏重在常民理論的建構過程而非常民理論的內涵。此外，Furnham及其他學者針對失業所進行的常民解釋研究，也只點出常民失業理論建構的「傾向」，說明常民失業歸因大致可分為個人、社會以及運氣等因素。為了進一步探討建構常民理論背後知識結構，本節將從文化及認知的觀點來說明這種意義系統的組織過程。本文認為，文化知識架構起我們對特定社會現象的解釋。以常民的婚姻理論來說，一般人對婚姻的理解就是建立在社會協定及文化共有的基礎上，而婚姻概念的存在也依附在社會所既定規範上，例如一般人對婚姻關係應維持長久的認知，即是本節所強調文化知識。

事實上，包括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各學門認知科學家皆在人類認知研究上投入頗多的心力，而近來文化(culture)在組織日常事物理解所扮演的角色逐漸受到認知科學家關注(Quinn, 1987 : 2)。Abelson 和 Schank(1977)曾提出劇本(script)概念做為建構日常事物理解的基礎，就企圖在一般重覆出現的生活經驗中，架構出一系列行動序列。其中最為認知科學界所津津樂道的為「餐廳劇本」(restaurant script)，描述一般人在餐廳所進行活動如就座、點菜、付賬、付小費等。這些行為模式雖然是平凡瑣事，但不可否認的皆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知識(cultural knowledge)。Abelson 和 Schank 的餐廳劇本概念說明文化知識在一般人生活經驗裡實際的運作情形，同樣也呈現文化和行動之間的可能連結。而這正

是本文所要呈現的是認知的文化觀點，主張文化知識(cultural knowledge)在人類理解活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而文化對行動的影響力有多大？文化的認知觀點究竟呈現哪些特質？彰顯哪些重要的面向？回答這些問題要先從「文化」談起。Geertz(1973：89)認為文化是：「隱藏於符號(symbol)中具有歷史傳承的意義類型，並藉由人類以象徵符號相互溝通、傳遞，所發展出對生活的知識及態度的承繼的概念系統。」Geertz的文化觀將文化視為隱藏於符號的意義系統，因此研究的取徑也就對焦在信念、儀式、慶典以及非正式文化形式如語言、閒談以及日常生活習慣等。除了符號觀點，UlfHannerz 則認為文化是「社群中共有的行為模式及觀點(outlook) (1969：184; 轉引自 Swidler, 1996：273)。」然而不管我們將文化定義成象徵的符號、整體的生活方式、或是個人的知識，傳統的文化觀點都無法解釋文化實際上是如何影響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一般人如何使用這些文化資源。

傳統社會學觀點如韋伯學派，將文化視為扮演類似「鐵路轉轍員」(switchmen)的角色，提供行動所需要的動機，Parson 功能學派則視文化為規範(norm)及價值(value)。不同於上述的文化觀點，為了闡述文化與行動連結的關係，Swidler(2001：6)將文化看成是意義的「工具箱」(tool kits)或是「戲目」(repertoires)。這種將文化比擬成「工具箱」的觀點具有幾項特色：首先Swidler(1996：273-74)指出文化提供各式各樣的文化組態(如儀式、世界觀)，以解決不同的問題。再者，在文化影響行動層面上，她強調所謂策略行動(strategies of action)。「策略」一詞在此指的並不是傳統概念中，特別經過計劃及設計，以達成目標的行動，而是為了符合不同生活情況的需要，所組成的不同行動方式(例如：一般人會考量親疏遠近而有不同的行動方式，相同的，職場上所需的溝通技巧也和家庭不同)。最後，她認為文化灌輸多元的技巧和理解力，塑造一般人成為社會的演員(social actor)，但她強調，文化所提供的是一般人建構行動方向的

工具，而不是直接地將他們塑造成單一的文化類型。

至於文化是如何影響行動？Swidler(1996：278-83)提出兩種不同模式說明在不同的情況下，文化運作方式並不相同。在「穩定生活」(settled lives)中，文化與行動緊密結合，常識(common sense)與傳統(traditions)提供建構行動的策略資源，並進一步內化一般人的行動技巧、習慣和經驗模式，因此在組織行動策略上，具有連續性。然而在「不穩定生活」(unsettled lives)情況下，不同的意識型態會出現彼此競爭，最後由勝出的意識型態(ideologies)建立新的行事風格及行動策略，經過反覆的練習之後，直接型塑行動的產生。舉例來說，60年代初期女性主義所發起性別平等運動，就從家庭、職場開始，歷經一場性別平等的革命。隨後，這些由意識型態所直接模塑的行動，又擴展到家庭暴力、色情、性騷擾等議題，使得這些原本在傳統上受到忽略的問題，受到廣泛重視。

因此，根據 Swidler 的說法，文化是以意識型態、傳統、常識的樣態呈現，三者和行動之間連結也不盡相同。Swidler(2001：94)採用 Stromberg 的觀點，將意識型態、傳統及常識看成一連續體。意識型態是一種明確(articulated)、自覺意識強烈信仰和儀式系統，提供行動問題單一統整的答案。另一方面，傳統則是一種明確的文化信仰和日常行事，但是一般人對它的存在卻感到習以為常，因此視其為生活的一部份。最後 Swidler 指出一般人通常無法感覺到常識的存在，因為常識是透明且自然，以致於成為社會結構的一部份。

基於上述的討論，本研究認為一般人使用文化知識的方式並不同。有的人(通常是少數)過的純意識型態型的生活，日常生活每一層面都要和信仰系統連貫，但是大部分的人過著穩定的生活，受到常識及文化傳統的長期薰陶：從諺語中對辛勤工作的歌頌，到自小到大父母及師長的諄諄教誨，或是媒體對特別世代及族群工作態度報導，進而塑造他們對工作、失業的看法，但卻沒有察覺到這些潛移

默化的常識信仰存在。因此，我認為儘管本文專注的是常民失業理論，背後仍有複雜的文化藍圖值得探究。當然這種預設的前提在於我認為日常行事及談話中充滿豐富的文化常識，而這些文化常識與經驗相連結並塑造了一般人的看法，同時也影響他們的思維、推論、詮釋。

綜合以上的看法，我認為行動策略是文化的產物，因此要分析一般人建構失業理論的模式，必須從一般人組合經驗方式、評估事實方法以及和社會連結方式出發。我把這些符號性的經驗(symbolic experience)及日常行事看成是常識的信仰系統，這並不是我刻意忽略傳統及意識型態在建構行動的重要性，而是認為若將常識信仰做為本文的論述主軸，更能清楚在文化信仰系統的光譜上，看到意識型態及傳統變動情形。第二、我將進一步去分析哪些文化模式限制或促發行動的形式，哪些構成了一般人熟悉的行動策略，以及哪些對行動具有持續的影響效果。本文認為隱喻及敘事是具有上述影響功能的文化要素(cultural elements)。這樣的看法原因在於：首先，隱喻是一種連結概念與語言顯著且普遍的認知過程，反映我們思考的方式，最重要的是藉由隱喻訊息背後知識架構的分析，可以看出一般人推理行為中，文化模式之間連結的情形。再者，正如本文在第一章所言，敘事是最常見的言說單元(discourse unit)，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說者都能將談話(talk)重新組合而成「故事」(story)。這種故事性的陳述，事實上包含事件(event)的先後順序、因果連結的模式、以及社會期待(例如：雙方的親密程度或是他人的評論)。在本研究中，受訪者在談論失業問題時，會對失業的成因的推論，再結合所謂適當行為知識及看法，對失業進行詮釋，因此，本文認為藉由敘事觀點角度，得以一窺文化模式的使用情形。

針對上面所討論過的理論架構，本節側重在文化與認知的討論，各小節的安排如下：第一部份整理常識(common sense)的相關文獻及探討進行整理，這是因為本文假設一般人的理論大部分是由常識所建構。第二部分則導入文化模式介

紹。由於一般人會從行動模式來詮釋失業的現象，因此第三部份整理 D'Andrade(1987)對一般人心智研究的成果，以及文化的行動模式。第四部分談的是隱喻，介紹 Lakoff & Johnson(1980)二領域模式，目的是整理過去從隱喻訊息，獲得文化模式的研究成果。

一、常識(common sense)

本文假定是：一般人在面對特定社會現象如失業時，會使用一套信仰系統架構起他們的看法及解釋。這套信仰系統除了源於專業的信仰體系之外，大多數是由具有常識特質的文化共有概念所組成。以本論文所探討的一般人對失業看法來看，儘管受訪者對供需等經濟法則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在進行失業原因推論時，絕大多數人還是使用一般常理之見(如：不願屈就、沒有專長)來詮釋失業現象的產生。因此本節將針對這種特定文化中所共有的、習以為常的信仰系統--常識(common sense)進行討論。

一開始，讓我們先從不同取徑，所進行的常識定義開始談起。

Garfinkel(1959:59)從社會學的觀點來定義常識：

社會認可推理及行動基礎，一般人使用它來處理每天的事物，並假設團體中的其他成員也以相同的方式使用它。(轉引自 Linde, 1993:193)

Labov(1966)認為常識的意義非常接近所謂「正確判斷」(good judgement)，是一種無法在書本中學習到的實用知識(轉引自 Linde, 1993:193)。

Geertz(1983:75-6)表示當我們說一個人有常識，是表示他有能力以平常的方式有效率的處理日常的問題。同樣地，當我們說一個人缺乏常識，其實並不說這個人笨，而是指他把日常的問題都搞的一場糊塗。Geertz 的說法特別指出了常識具有的規範本質。換言之，常識一方面具有普遍性，一方面卻又規範事情應該如何進

行。Linde(1993:194)就認為常識具有普遍性(universal)及規範性(normative)，只不過常識通常是以普遍特質來掩蓋其規範的一面。這種以普遍特質來包裝常識規範特質的方式，用意在於讓一般人認為一切常識都是習以為常的，無需改變的。

Swidler(2001:95-98)也引用 Geertz 的說法，表示一般人無法察覺到常識的存在，認為常識是世界結構中自然、透明的部分，是客觀真實而且不需要明確的理論支持或細膩推論的既成事實。不過，Swidler 特別強調並非所有人都同意常識的說法，以諺語為例，本身即充滿矛盾的說法。McKeachie 和 Doyle(1966)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們以英文中「三思而後行」(Look before you leap.)及「遲疑者錯失良機」(He who hesitates is lost.)兩個諺語為例，說明在民間智慧(folk wisdom)中，兩個相互衝突的諺語同時存在，而且這些民間智慧並沒有進一步說明這些諺語應該在何時使用(轉引自 Furnham, 1988:24)。

Swidler(2001:93-99)認為常識由一般日常行事所界定，但是和傳統(tradition)不同，常識並不是由特定的群體所支持的日常行事所界定，換言之，我們不會用常識來區分特定的團體。因此，儘管常識是部分的、片段的而且通常是內部結構互相矛盾的，但卻是無所不在的。

笛卡兒曾經將常識比喻成全世界最暢銷的貨物，因為每個人都相信常識的供應源源不絕，但卻一直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麼(轉引自 Furnham, 1988:26)。

Swidler(2001:96)也認為我們一直很難界定常識，原因在於我們對於某些特定的文化概念的看法以及對行動的影響程度並不相同。她舉宗教信仰為例，某些人認為宗教是一種意識型態(想想回教徒對西方價值的敵視)，對其他人來說卻是傳統(台灣每年的媽祖繞境)，或是常識(宗教教人行善)。再者，科學在一開始雖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意識型態(西方歷史對地球是方的還是圓的爭議)，但在後來卻成為常識。因此 Swidler(2001:97)認為時間一久，意識型態可能轉變成為傳統和常識。

同樣的，相反的移動也可能出現，傳統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可能會再度成為意識型態。一如 Swidler(2001:97)所說：意識型態、傳統和常識代表的是文化意義慣例化的不同階段。

二、文化模式(cultural model)³

前面提到常識系仰系統架構起一般人的觀點及理論，接下來我們要談是這些常識性的文化知識是如何組成的。認知人類學家稱這種文化知識組織樣貌為文化模式，研究關注的是一般人日常的認知模式，範圍包括一般人如何去看待心智、情感運作以及一般日常經驗(Keesing, 1987:371)。他們將文化模式定義為社會成員所廣泛共享先驗的、習以為常的模式，是一般人行事的準據、詮釋經驗的獨特方式，在我們對社會世界的理解上，扮演重要的角色。(Quinn, 1987:6)

此外，從文化模式的字義上亦可窺得其涵義。Keesing(1987:374)指出民間模式或文化模式具有兩個重要的面向：第一強調是由常民或文化所建構的共有性(sharedness)，其次則是模式性(modelness)。首先，Keesing 認為使用「民間」(folk)一詞主要指涉此一模式的常識(common sense)本質，表示這些模式是由文化所建構的常識所組成。因為具有常識特質，所以解釋的是屬於經驗的、可預期的日常生活事物。至於「模式」則說明其範式的(paradigmatic)特質，是一般人協商意義的文化指涉架構。

至於如何探尋文化模式？社會語言學家認為，談話(talk)是一般人協商理解

³文化模式(cultural model)與民間模式(folk model)兩名詞雖同指一物但仍有些微的差異，1983年普林斯頓大學所舉行的民間模式(folk models)研討會，研討會後更名為文化模式(cultural models)。Sweetser(1987)認為民間模式(folk model)一詞指涉此一模式的非專家性(non-expert)，而文化模式(cultural model)則是強調文化框架模塑我們世界的事實。

及達成社會目標重要方式。因此，學者特別專注於人類的談話行爲，並主張文化模式潛藏在語言中。語言學家關心的是語言現象，如定義、隱喻等對文化模式具有哪些重要意涵，人類學家則是從相反的方向進行分析，把語言使用當成了解文化模式的線索，因此研究重點放在推理(Hutchins,1980; Quinn, 1987)、解決問題(Kempton, 1987; White, 1987)、以及評論他人的行爲(D'Andrade, 1985; Holland & Skinner, 1987; Price, 1987)。無論如何，語言學家及人類學家研究方向雖然相反，但是企圖想要了解的都是文化共享的知識，是如何植入一系列的原型事件中。對於語言學家而言，文化模式在字義及語意上，扮演關鍵的角色，對人類學家而言，語言使用則提供重構文化模式的最佳資料。

三、行動、責任、歸因的文化模式

如前所述，文化模式是特定群體所共有的文化框架，在一般人日常生活意義建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在一般人互動中架構起我們的行動及期待。在本研究的失業訪談中，受訪者所建立的個人失業理論，具有顯著因果連結的文化模式。換言之，在詮釋失業成因時，他們會針對行動結果(即失業)進行行動成因的分析，而這牽涉到一般人對引發行動的可能**意圖(intention)**(為什麼會失業?)的推論及詮釋，因此本節將援引 D'Andrade(1987：112-46)常民的心智模式(folk model of mind)的研究，針對一般人對意圖在行動、**責任**、**歸因**文化模式所扮演的角色進行文獻介紹。

D'Andrade(1987：115-128)曾針對一般人對心智(mind)運作的看法進行研究，提出了美國人心智的模式。D'Andrade 認為，此一模式之所以稱為常民(folk)模式，一方面是因為它指的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常識解釋，另一方面則說明此一模式相對於「專門知識」以及「科學化」的心智模式。D'Andrade 在論文中詳述了一般人對心智運作狀態的看法，例如信仰(beliefs)、冀望(desires)、

看法(perceptions)、意圖(intentions)、決心(resolutions)及情緒(emotions)，以及這些類在心智狀態和外在行动之間的關係。

在此一模式中，意圖是自我行動重要核心。以理想型的行動模式為例，根據 D'Andrade 研究顯示，一般人認為每一項行動都必須要有具有意圖的行動者(agent)來執行行動(action)，而行動則導致結果(consequences)。在這個模式中，意圖引發行動，而行動導致預期的結果。行動者相信(belief)他的行動 A 會產生結果 C，以及冀望(desire)經由行動 A 產出結果 C，兩項心智狀態皆是產生結果 C 的重要意圖組成。D'Andrade 認為這種行動模式是美國人(甚至是歐洲人)對自己及他人行動的詮釋模式。本研究主張 D'Andrade 常民的行動模式，意即一般人的行動是由意圖所引發的說法，亦可放在台灣社會脈絡下，進行初探性的研究。當然，本文之所以抱持這種論點，在於本文認為這種行動的文化模式是具有跨文化的普同性。舉例來說，如果我們看到一個人執行一個行動(例如打開電視)，我們會假定這個行動是由意圖所導致(打開電視的意圖)。

行動模式中對一般人對行動意圖所進行倒溯臆測，同樣也形成一般人對行動結果責任分配。責任的概念是根據行動的理想型模式而來，行動者必須對自己的行動負責，這是因為這些行動是由其意圖導致。相同的，行動者必須對行動的結果負責，因為，行動者和行動之間有因果的連結，這點已經在理想的行動模式中提及，再者，行動和結果之間也具有因果連結的關係(Coulson, 2002:186)。

以本研究所進行常民失業理論為例，受訪者認為失業現象是由於失業者不願屈就所致，「不願屈就」也就是受訪者對失業者意圖的推論，而這種意圖外顯成「挑工作」的行為，因而造成「失業」的結果，最後再歸結個人應對失業負責。從以上案例中，本研究認為一個人的意圖可以是由冀望(desires)、願望(wishes)、需求(needs)、信仰(beliefs)或上述的綜合所引發，也因此認為一般人在解釋他人

的行動時，會從冀望產生意圖，意圖導致行動的順序來進行詮釋以及責任評估。因此，我們可以說責任的歸因是根據心智及行動模式的運用，一般人認為行動者應該對他自己的行動結果負責，是因為他們深信行動結果與意圖之間具有連結使然。

行動結果會引發個人或他人對行動結果的評估。正面評估或負面評估，即一個人接受讚揚或譴責，端賴其對行動結果所應負的責任而定，如果行動者應對某一個行動負責，而且行動具有好的結果(這裡當然是評估者的主觀認定)，則行動者會受到讚揚，但如果經評斷行動結果不佳，行動者則會招致譴責甚至處罰。因此歸因的文化模式，是和行動模式共存的，聯結的部分即是對責任的認定。換言之，個人針對行動進行評價，除了必須具備行動模式的文化知識外，對既成行動結果的成因推論，也包含對行動結果責任的認定。舉例來說，上一章提到英國清教徒對貧窮的成因解釋，傾向為工作懶散及金錢管理不當(Frunham, 1982a:283)，我們發現清教徒對負面的行動結果(貧窮)及行動責任的認定(個人)，也就共同組成清教徒對貧窮形成原因的解釋。基於相同的推論基礎，清教徒認為貧窮是個人責任，無關政府，所以在社會福利等救助措施上，是持反對的意見。

四、隱喻

除了已具研究成果的行動文化模式，語言學家過去的研究顯示，證明隱喻是重要語言機制，反映人類思考的重要來源(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 1993; Sweester 1992)。早期的哲學家，如亞里斯多德和傳統的雄辯家，把隱喻視為語言的裝飾，但過去二十多年來，認知學家研究發現，隱喻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而是架構我們對世界看法的概念及經驗過程。正如 Lakoff 和 Johnson (1980：3-4) 在《我們賴以維生的隱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書中所揭示：隱喻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不僅在語言中，而且還存在在我們的思想及行動中。因此，

隱喻研究焦點也就轉向隱喻的概念及指涉架構。

如前所述，隱喻反映一般人的思考過程，是一個建構我們概念及經驗過程，因此隱喻成爲分析思想與語言關係的最佳來源。例如我們會將「問題」具像化成壓迫的「重量」，在本研究的訪談中，受訪者在面臨失業危機時，就曾表示「肩上的重擔」壓的他喘不過氣來。從這個例子，可以得知隱喻具有將經驗具體化功能：它將深植在我們的身體經驗的概念系統(重量)及各種象徵互動形式(問題)相互連結，透過想像過程，這些經驗得以映射到抽象概念上。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隱喻是以一類事物來了解另一類事物的認知歷程及構思方式(鄧育仁&孫式文，2000a:38)，藉由隱喻式訊息的傳達，使我們得以掌握新的概念。最重要的是，就在這種概念連結的認知過程中，我們得以分析埋藏在隱喻訊息中的文化模式。以上述的「肩上的重擔」爲例，我們之所以能理解受訪者的感受，在於我們具備有「重量」及「問題」等文化模式的知識。

藉由探討一般民眾失業隱喻的使用，了解架構失業概念的文化模式，正是本篇論文的目的。支撐這樣論述取徑的理論背景在於，本文認爲藉由探索隱喻的運作方式，可以獲得更多的文化訊息，因爲隱喻的基本概念架構呈現基本的文化知識或價值。隱喻相關理論中，Lakoff & Johnson (1980)的二領域模式(cross-domain mapping)說明了概念之間連結的系統性，特別是在映射(mapping)推導上有較爲細膩的理論架構，得以解釋文化模式在映射過程扮演的角色，因此下文將針對二領域模式進行文獻介紹，並說明命題基模與意像基模在跨領域映射中所扮演角色及功能，以及和文化模式之間的關係。

(一)二領域模式

Lakoff 和 Johnson(1980:53)提出二領域模式來解釋隱喻如何傳達認知的歷程。他們認為隱喻基本上是以某個領域的事物、事件、經驗現象即來源域(source domain)，來理解另一個領域的事物、事件、或經驗現象，即所謂的目標域(target domain)。一般而言，來源域相對來說比目標域具體、清晰，我們就藉由對來源域的認識，系統性地理解目標域。兩領域間的映射關係(mapping relation)重新賦予或解構目標域原有的經驗秩序。

Lakoff 及 Johnson (1980:9)二領域模式說明隱喻在語言及概念架構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認知語言學家依循此一取徑，發現隱喻式的映射(metaphoric mapping)在認知及語言現象上具有重要的影響性。近來，隱喻的相關研究側重於來源域的概念架構如何影響目標域的發展及意義架構，特別是在推理等認知活動上(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 1987: 95-96)。這種研究方向，事實上說明映射是建立在來源域與目標域共有的架構關係上；再者，兩者之間的對應關係亦是根據此一共有架構關係上的共同性(commonity)所建立的。說的明白些，在隱喻的概念化過程裡，來源域和目標域具有類似的指涉架構，而兩領域間的對應關係就是透過認知基模—命題(proposition)或意像(image)等基模完成，繼而推導出新的指涉。

(二)命題基模(proposition-schemas)和意像基模(image-schemas)

命題基模(proposition-schemas)以及意像模式(image-schemas)在認知活動上分別扮演不同的功能。命題基模是指連結命題(亦即核心意義)的基模組成(composite)，而這些基模具有文化共享的意涵。意像基模則是具有視覺意像概念，提供隱喻映射意象及視覺的組成成分。因此，兩者皆傳達特定的知識訊息。

基模的概念則是來自於 Hutchins(1980: 51)，意指具有組織的一套知識體系。Hutchins (1980: 51)及 Lakoff(1984: 10)皆認為命題基模陳述(specify)概念及

概念之間的關係(轉引自 Quinn, 1987:25)。Quinn(1987)曾針對美國人的婚姻文化模式進行的研究,結果發現一般人在談話時連結命題和命題之間的因果關係經常是省略的,而 Linde(1987: 353)研究一般人對職業選擇的看法也有相同發現。Quinn(ibid: 25)認為不管是推理者或聽者,都具有能力進一步澄清並還原這些隱而不顯的連結部分。但也正因為這些連結命題基模的細節資訊能夠被省略,所以儘管說者歷經冗長的敘述,聽者仍能掌握住核心意義,簡潔地達成結論。因此,這些可用來立即提取因果鏈結,且具有穩定、文化上共享的命題基模不僅加速了傳遞推論的任務,也使得這些推論在第一時間內迅速且正確的完成。以 Quinn(1987: 188)研究美國人的婚姻概念為例,她發現一般人對婚姻的推理模式是從「一開始認識不清」造成「無法相互受利」因此導致「婚姻困難」也就無法維持「持久」的關係,而這些命題基模相互連結,構成了婚姻的文化模式。

另一方面,意像基模在認知活動中扮演不同的功能。首先,意像基模包含意像(image)以及基模的概念。除了視覺的成分,意像基模具有各種不同種類的運動知覺(kinaesthetic)資訊(Quinn & Holland, 1987: 24-30)。例如 Lakoff(1984: 10)認為我們有關棒球投球的知識包含軌道基模,我們對蠟燭的知識也包含對細長物體的基模。明顯看來,意像基模實際上也傳達物理現象的相關知識,例如形狀和移動。

意像基模在隱喻中,同樣具有跨領域映射的特色。Lakoff 和 Kovecses(1987: 201-3)發現「憤怒(anger)」可以藉由容器中熱液體圖像而予以概念化; Collins 及 Gentner(1987: 249-54)研究也發現,學生解釋「蒸發」(evaporation)的過程時,也會使用「沙礫」、「門閥」、「容器」、「火箭發射」及「擁擠空間」等圖像概念進行說明。Kempton(1987: 222-237)針對一般人如何發展一套自己使用電熱器的理論同樣也發現,他們會使用圖像來建構自己的理論。舉例來說,有的人會將電熱控制器想像成需要轉動的「水龍頭似的裝置」;有些人則將它看成使用開關的「電

器按鈕」。

從上述的分析得知，文化模式是以命題基模或意像基模的形式，透過隱喻架構起一系列理想型事件(idealized events)，而這些理想型事件都是我們日常經驗得以理解的事務。強調「理想型」(ideal)，則在於說明文化模式呈現的是真實世界的簡化概念。以 Quinn(1987：31)針對美國婚姻文化模式研究為例，儘管美國人多半同意婚姻經營不容易，但不見得同意婚姻應該持久。因此，命題基模「婚姻是持久」並非出自統計，而是來自於一般人對成功婚姻理想性觀點。